

跨越语言的移民言说——《扶桑》在美国的译介研究

Abstract: The book *Fusang* penned by Geling Yan, is a highly acclaimed novel on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America, and its translation, once released, was also wooed by the American readers and hit the 2001 *The Los Angeles Times* bestseller list, which was an unusual success for sinophon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novel, various factors like the sensual and exotic taste of book itself, a competent and suitable translator, the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practice are found to lie behind its market success, and in the meantime, problems like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major characters, the failure to communicate the political message, and the loss of language flavor also hide beneath the surfa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essay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Fusang, Geling Yan, English translation, “going-out”

摘要: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是移民文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英译出版后反响不俗,一举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汉语文学在美国译介少见的成功案例。本文将聚焦《扶桑》英译本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并结合翻译的具体过程,深入探讨其“畅销”的动因,并揭示“畅销”背后的隐忧。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扶桑》; 严歌苓; 英译; “走出去”

一、引言

华人移民文学或华人离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但长期以来,其地位一直处于较边缘的状态,相关译介研究更是鲜见。笔者以为,相较于大陆当代文学,华人移民文学在译介时有着先天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应值得国内翻译研究者重视。

在华人移民文学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当属美华文学。就创作水平而论,美华文学不啻执牛耳者,“域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就创作的艺术水准而言,都难与美华文学比肩”。(公仲, 2003: 41)而在美华作家中,严歌苓则可谓翘楚人物,是“当今北美地区最具实力、也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陈瑞林, 2003: 35)。自八十年代末移居美国后,她一直保持高产的状态,在汉英双语的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丰收。其创作的小说如《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扶桑》、*Banquet Bug* 等都荣获国内外文学奖项的肯定,并在汉英文学市场都取得了不俗的销售成绩,而其中最成功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扶桑》。

小说《扶桑》是严歌苓赴美之后的一部移民题材小说,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旧金山为背景,以华人妓女扶桑和白人少年之间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对中西文化和种族冲突有着深刻揭露,曾获 1995 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被王德威评作“严歌苓所有得奖作品中最好的一部”(王德威, 1996: vi-vii)。2001 年小说由美国 Hyperion 出版社英译出版,成功打进了美国主流市场,获得《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等大报的推介,并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是汉语文学译介成功的典范。

本文将关注小说《扶桑》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从作品内容、译者择取、翻译策略、出版宣传等方面探讨小说“畅销”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以普通读者反馈、报纸文学评论等出发,揭示小说“畅销”背后的隐忧,并反思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二、 内因与外因：《扶桑》英译本畅销的驱动因素

一般来说，“美国人不怎么看重翻译的东西，他们对翻译总是有些怀疑，而美国人又懒得学外文，所以就只看英美的作品”（葛浩文、季进，2009：50）。据2002年Poets and Writers杂志的统计，翻译作品还不到美国文学出版的2%，而汉语文学翻译所占的份额更微乎其微。即使被译介的中国文学也大都受读者所冷遇。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葛浩文就坦言，“能卖一两千本就算是好的了”（葛浩文、季进，51）。

而小说《扶桑》的英译本则在美国读者中大获成功。2001年4月，小说由美国著名商业出版社Hyperion旗下的Hyperion East子公司以精装本形式英译出版，同年即登上了《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次年5月，由于销量喜人，小说以简装本形式在美国再版，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Hyperion East出版公司的创始人、《扶桑》英译本编辑Will Schwalbe也在采访中证实：“严歌苓的书卖的很好，不仅仅在这里（美国），在全球销量也不错。”（Schwalbe, 2006）

《扶桑》的英译本之所以能在美国图书市场大受欢迎，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十分复杂，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接下来本文将从作品特色、译者择取、翻译策略、出版宣传等方面深入考察《扶桑》英译本畅销的动因。

1. 符合美国读者趣味的作品特色

在内容和题材上，小说恰好符合美国读者的审美趣味。相对于欧洲读者而言，美国读者的阅读喜好更加大众化。“所谓的知识分子小说他们不怎么喜欢。他们喜欢的有两三种吧，一种是sex多一点。第二种是politics多一点。”（葛浩文，2009：02）“美国人跟古典和近现代文学名著已经基本‘绝缘’，他们更爱读的是犯罪、侦探、爱情和悬念小说。如果这些小说以历史或异国风情为背景则更会赢得读者的欢迎”。（刘亚伟，2004）这一点也可以从美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得到印证。以最权威的《今日美国报》畅销书TOP 150为例，2013年7月10日雄踞前三位的分别是*Inferno*（犯罪、悬疑小说），*Second Honeymoon*（爱情、犯罪、侦探），*And the Mountains Echoes*（讲述阿富汗小村庄的家族历史），几乎齐集了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各种元素。而小说《扶桑》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华人移民史为背景，以华人妓女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畸形爱恋为主线，其中不乏性爱场面的描写，还涉及到排华法案、旧金山反华游行等重大政治事件，原本就汇聚了爱情、性、历史、政治、异国风情等元素。此外，小说中极具传奇色彩的华人恶霸大勇则增加了作品中的犯罪元素，使原本就很丰盛的大餐更加多姿多彩，受到美国读者欢迎也不意外。

2. 优秀契合的译者

关于作家与译者，许钧教授曾有过精彩论述：“一个好的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毕飞宇，2012：53）。严歌苓与《扶桑》的美国译者Cathy Silber正是如此。从各方面来讲，Cathy Silber都是《扶桑》英译的上佳人选。

首先，Cathy Silber具有深厚的中文素养和扎实的汉学功底。她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威廉姆斯大学、汉密尔顿大学执教汉语和中国文学，是典型的汉学家译者。另外，她曾在中国北京、内蒙古和湖南等地生活与工作数年，担任大学英文教师、外文出版社翻译/编辑等职务，并在乡间进行过

实地考察,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有着切实的了解。而且,她在汉语语言文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女书研究领域,其博士论文即针对此展开。此外,她还撰写过有关中国女作家以及中国文化的学术文章,如“Privacy in *Dream of Red Chamber*”等,有十分扎实的汉学功底。

其次, Cathy Silber 在汉语当代文学英译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历。在外文社工作期间,她就英译了王蒙、钱刚、冯骥才、吴藻、苏青等作家的作品。1994 年她与 Chris Berry 又合译了澳籍华裔女作家丁晓琦的小说《女儿楼》(*Maidenhome*),并获得澳大利亚翻译奖 The Dinny O’Hearn/SBS Priz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翻译水平得到一致肯定。她对翻译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翻译有文学价值、能与她产生共鸣的作品,翻译中应使英文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类似的体验,同时文学译者也应该具备作家的能力与敏感(陈丽娟, 2011: 124)。可以说, Cathy Silber 是一位具有丰富翻译经历、出色翻译能力,和一定翻译理论素养的译者。

再次, Cathy Silber 的个人气质也与《扶桑》十分符合。作为女性,她和严歌苓这位女性作家更容易产生共鸣,更能理解女性语言的细微之处。而且,其对被压迫女性的同情也与《扶桑》这部以妓女为主角的女性视角小说不谋而合。在其博士论文 *Nushu(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的前言中她就写道,她内心深处把“女书的书写者视做勇敢的女英雄,在遥远的战线上独自进行反抗性别压迫的战争”,可见其内心是反感男权主义,对被广大的压迫女性十分同情的。(Silber, 1995: 5)这与《扶桑》中彰显女性虽饱受蹂躏但依然保有内心隐秘自由的出发点恰好相契。

汉语文学英译的人才原本就十分稀缺,而 Cathy Silber 能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更是尤为不易。正是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严歌苓在读过她的译作后主动联系其翻译《扶桑》。

3. 本土化的翻译策略

所谓翻译策略本土化,指的是译者为顺应本土文化,消除原语的异质性或陌生性,为促进译本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而选择的一种翻译方式。(袁榕, 2010: 88)在《扶桑》的具体英译中,以读者为依归,以市场为导向的本土化翻译策略被大量采用,成为《扶桑》商业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又主要体现在译本流畅透明的语言、异质文化的过滤,文学传统的皈依,以及书名翻译上。

(1) 流畅透明的语言

虽然异化翻译,或“抵抗式翻译”为韦努蒂及众多翻译研究者所提倡,在图书市场上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透明的归化翻译。如葛浩文就认为,理想的译作应如美国学者弗伦兹所言,是“运用现代语汇与词序的当代作品,出之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现法,看上去不应当像是翻译”(葛浩文, 1980: 106)。美国读者“在乎文字世界里是否有他们寻觅的某种酣畅淋漓与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从而获得某种阅读快感”(胡安江, 2010: 14),译文“需要被润色,直到我们忘记它们是翻译作品,就像一扇明亮的窗户,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在我们和我们所视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什么”(马会娟, 2013: 68)。

而《扶桑》的译文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著名世界文学评论期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就曾评价道:“她(严歌苓)是用汉语书写的,但是 Cathy Silber 的译作是如此充满灵气,要不是封皮上的四条推介语明明白白地确认,我们都看不出来这是译作”(Kinkley, 2002: 137)。而这一点也在普通读者的反馈中得到了印证,如著名书评网站 Goodreads 上的许多读者都提到了酣畅的阅读体验。

其实早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前, Cathy Silber 就与编辑 Will Schewalbe 商定下了翻译的总

体方向，即让小说读起来更像英语小说（English-Language novel）（金雯，2006：572），具备“口语化和简单明了”（Colloquial and straightforward）的风格（陈丽娟，2011：132）。因此译文整体读起来非常顺畅，看不出是翻译作品。

（2）异质文化的过滤

为了不给美国读者带来过多理解障碍，小说英译本中也过滤掉了许多体现中国特色文化的内容。以度量衡的翻译为例，除了“斤”有“catty”与之对应，大部分的度量单位在英文中存在词汇空缺，因此大多都被译者直接过滤了，而过滤的手段又分为两种。

其一，将中文度量单位换算为大致对应的英文度量单位。例如“不足三寸”译为“less than four inches”，“半尺”译为“two feet”，“三十里”译为“ten miles”等。

其二，根据语境进行意译。例如：

例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夏天，圣弗朗西斯科那条六尺宽的唐人巷里，某个笼格般的窗内站着个不小巧的女子，就是你。（p. 3）

译文：On a summer day in the late 1860s, there's a rather large girl standing in a barred window on a narrow lan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nd that's you. (p. 3)

在上例中，具体的数字被淡化，“六尺宽”在译文里已失去了精确度量的意义。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无需采用音译及加注的厚译法，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需被“惊动”，从而能更沉浸于作品之中，保障阅读快感。

（3）文学传统的皈依

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有着迥异的文学传统，和英语文学相比，汉语文学的抒情性和议论性特征极其分明。

以抒情性为例，“就其主流而言，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抒情传统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即使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即使叙事文学取代了抒情文学的统治地位而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叙事文学依然打上抒情文学的烙印”（季光邈，2006：96-104）小说《扶桑》的抒情特征尤其明显，在翻译时，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些倾向往往被归化。例如，在描写克里斯与扶桑阔别两年之后的相遇时，严歌苓用充满抒情性的语言浓墨重彩地写道，“他整整找了它两年。他的寻找是他一夜间发育的身体，是他不合情理的寡欢眼神，是他骑马无缘无故的狂奔，是他偶尔听见一句中国话的战栗，是他对父亲的东方古玩盗窃的冲动。他仍想象自己是神话中的骑侠，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营救。他得以剑斩断囿她于其中的罪恶”（p.57）。而在译本中，译者用一句平实的“He looked for her for two whole years.”（p.59）便一笔带过，抒情意味大打折扣。这与译者 Cathy Silber 的翻译策略不无关系，在翻译时，她会干脆略过那些显得“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的描述。（陈丽娟，2011：133）。

除了浓烈的抒情风格外，小说《扶桑》也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议论性传统，通过很多论说性的语言来呈现她对文化冲突的思辨与拷问，而这又常被浸润于英语文学传统的译者和编辑认为过于“直白”（explicitness），“说教”（didacticism）和“不必要的阐释”（gratuitous interpretation），从而在翻译中都被简化或删除。（陈丽娟，2011：132-133）例如，在提到电视上的美国白人光头青年对亚洲人的无缘无故的仇恨时，严歌苓写道：“我告诉你，扶桑，这样的人一直从你那时活到现在。他们的仇恨不需要传宗接代就活到了现在。人有这个需要去仇恨。仇恨像信仰和理想一样使人创造奇迹，创造伟大的忠贞和背叛”（p. 212）。这样的文字在《扶桑》中俯拾即是，是严歌苓哲学思辨的表达，政治立场的言说，在译文中却被完

全省去,因为正如《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所言,在英语文学传统中,“间接展示(show)出来要比直接说(tell)出来更有效”(Booth, 2010: 28)。

整体来看,小说英译本皈依了英语小说的文学传统,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译本在美国的畅销起到了积极作用。

(4) 书名的翻译

一个好的书名对于一本书的市场成功至关重要,对于翻译文学尤其如此。《扶桑》的译者与编辑也深谙此理,因此在翻译书名时将其意译为“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一来过滤了对于美国读者过于陌生的文化内涵,二来补充了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猎奇元素,三来点出了小说的悲伤故事情调,对小说译本的畅销功不可没。

首先,“扶桑”一词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可有多种解读,引起无数联想。它出自《山海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指代的是神话中的树,谓为日出处,具有古老的神性和无限的包容性,是一种深刻的隐喻。此外,“扶桑”还指涉某古国。

《梁书·诸夷传·扶桑国》记载道,“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近来,不少学者将该古国认定为加州,而这正是小说《扶桑》的故事发生地。当然,“扶桑”还是一种美丽的花,以大红色最为常见,与妓女扶桑的女性特征和衣着特色也不无契合。然而,对于大多数美国读者而言,“Fusang”只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符号,无法引起任何联想,自然难以产生阅读兴趣,因此直译显然行不通。即便在书名中进行解释,也要么失之冗长,要么失之偏颇,所以异化的直译并非明智之举。

相对而言,“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的书名显然对美国读者更有吸引力。很多汉语小说英译时都会在书名里加上“女人(woman)”,“女儿(daughter)”,“宝贝(baby)”等带有女性色彩的字眼以期获得英语读者青睐。例如,虹影的《上海王》被译为“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被译为“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kong”,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被译为“Two Women of China: Mulberry and Peach”等。而王安忆的《长恨歌》英译出版时,也有出版社出于销路考虑,要求把书名改为《上海小姐》或是《上海女儿》。(王德威, 2008: 77)。确实,标题中含有“daughter”的华裔英文小说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如李彦的“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以及与《扶桑》同年出版并大热的谭恩美小说“The Bonesetter’s Daughter”(《接骨师之女》)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编辑 Will Schwalbe 最终建议将书名译为“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4. 专业的商业出版运作

和当时大多数通过大学出版社译介出版的汉语小说不同,《扶桑》的译本是由美国主流商业出版社 Hyperion 旗下的 Hyperion East 公司出版的。

Hyperion 公司成立于 1991 年,虽然并不隶属于美国最具盛名的五大出版社,但却一直在文学出版行业势头强劲,尤其是在新兴作家的挖掘和扶持上不遗余力,其出版的小说如“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For One More Day”等常年占据美国各大畅销排行榜,在美国的畅销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旗下的 Hyperion East 子公司则更是专注于亚洲文学的翻译出版,出版了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杜尔、越南作家杨秋香、韩国作家李文烈等的翻译作品,都取得了很大市场成功,可以说在亚洲文学的译介上经验丰富。Hyperion East 的时任掌门人,也即小说英译本的编辑 Will Schwalbe 则早在执掌 Hyperion East 就曾出版过苏童、王朔等人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人脉。

和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出版机构相比,商业出版社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

销售渠道更广。例如，大学出版社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在大学图书馆能找到，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罗福林，2010：81），而像 Hyperion 这样的大出版公司则有固定的连锁书店经销其图书，辐射范围更广。

除此之外，在《扶桑》英译本的推介过程中，Hyperion 还充分利用了报刊书评的宣传作用。它将样书寄送给许多美国主流报刊的书评栏目，并获得了《今日美国报》(USA Today)、《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经济学人》(Economist) 等主要书评报刊的推介。其中，《今日美国报》和《纽约时报》同属美国三大报，2001 年平均日发行量前者为 185,2592 份位列第一，后者为 115,9954 份位居第三，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二者的书评栏目也十分权威，为读者所认可。而《当代世界文学》则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摇篮”，是英语世界中历史最悠久的世界文学类杂志，具有极高的专业参考性。《出版者周刊》和《图书馆杂志》则是美国图书馆和书商的首要参考指南。这些推介使得《扶桑》的英译本获得了一定知名度，打开了市场。

当然，在作家和作品包装上，出版社也费了不少心思。例如，严歌苓的政治身份常被作为卖点，在宣传中她常被塑造为在“天安门事件”后逃往美国的受迫害作家。与此同时，由她亲自改编并在美国引起轰动的大陆禁片《天浴》也成了宣传的另一个重点。而在作品包装上，小说硬皮本的封面以旧唐人街的黑白照片为背景，照片正中是一个穿着旧式中式大襟的妇女形象，并以泛黄的透明相框覆盖。厚重的历史感、浓烈的异国风情，以及对图中女子深刻的同情等都呼之欲出。而在纸皮本的封面中，异国情调则更为突出，在难以洞穿的黑色背景下，是一个东方女子惨白的脸，她浓妆艳抹、看不清表情，手中持着古老的中式折扇，营造了一种迷一样的氛围，很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而在封底，除了简短的简介外，还援引了三条推介语(Blurb)，分别来自著名华裔作家哈金(Ha Jin)、黄哲伦(David Henry Wang)、《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对小说的“erotic”, “sensual”的特征进行了重点强调，迎合了美国大众读者的趣味。

综上所述，符合美国读者趣味的作品特色、优秀契合的译者、本土化的翻译策略、以及专业的商业出版运作是《扶桑》英译本得以畅销的四大驱动因素。然而，在“畅销”背后依然存在不少隐忧，值得注意。

三、忧虑与启示：关于《扶桑》英译的反思

受到翻译的删减和改写影响，以及读者西方中心主义“有色眼镜”的过滤，《扶桑》英译本的“畅销”背后，依然存在被误读和表达失落的隐忧。具体体现为：人物塑造深为诟病，政治言说知音难寻、语言特色难以再现等。而与此同时，这也让我们反思在汉语文学英译时翻译策略的取舍、商业出版社的利弊等。

1. 《扶桑》英译本畅销之后的忧虑

(1) 深为诟病的人物塑造

几乎所有书评在评价扶桑这一人物时都会用到“inscrutable”, “opaque”这样的字眼，不少文章如《图书馆杂志》更是尖锐地写道：“尽管小说的历史设定很引人入胜，但扶桑这一角色从来没有真正丰满起来，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其个性的坚韧还是其智商的缺乏而使她经大难

而不死。”(Towey, 2001:203)相较于报刊书评的冷静客观,普通读者对扶桑这一人物的诟病则更为强烈,如 Goodreads 上就有读者抱怨“砖头都比她有智商”。除了扶桑以外,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克里斯也为读者所诟病,同样被认为是“incomprehensible”,而这些都与小说翻译中对人物描写的大量删减,以及读者的西方主义视角有关。

其实,严歌苓一直热衷在小说中塑造谦卑隐忍的“地母”形象,从《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一直延伸到《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而扶桑则是她“地母”形象的集大成者。在采访时她也证实道,“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性是母性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严歌苓,2005)。在小说中,她借克里斯之口说道:“多么好的女人,诚心诚意地像脚下一抔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扶桑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那泥土般的真诚的女性。”(p. 142)这正是理解扶桑的关键,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即可以理解扶桑对苦难的忍受,对伤害的宽容,她迷一样的微笑与以及其看似的愚蠢。然而在译文中这段文字被完全删除,许多类似的表达也被过滤掉,造成了美国读者理解的隔阂。另外,美国读者的西方主义视角也是人物误读的一个原因,例如 Goodreads 上一名读者就十分不解扶桑为什么不逃离妓院,而没有换位思考,去深入考察扶桑身处的环境,体味扶桑的无奈。

而克里斯的形象也因为翻译的大量删减变得模糊不清。在小说中,严歌苓用大量的笔墨剖析了他对扶桑的感情,“东方产生的古老的母性的意义在这女儿身上如此血淋淋的鲜活,这个东方女人把他征服了。……但在独自骑马,捧一本诗,无目的地逛在天与地之间时,他发现自己用很少的几个字眼,用错误的句法在独白,这是他在和心里的女人交谈。……克里斯一声不响地疯狂,他全身投入了那个骑士角色:去披荆斩棘、去跨越千山万水,去拯救。”(p. 103)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并且眼前清晰浮现出一个忧郁的少年形象。但是,这些细腻的表达在英文中却无迹可寻,使得美国读者难以对克里斯产生共鸣。

(2) 一厢情愿的政治言说

严歌苓曾说:“我觉得写小说就应该是实现自己在道德、美学和政治上的抱负的过程”。(严歌苓,2003)其中,政治抱负在《扶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作为移民作家,严歌苓以“写作来反映民族身份、叙述边缘群体的文化困境、改善中国形象,以期获得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接受”(Zhang, 2011:14)。在小说中,她把扶桑作为古老东方的象征,虽受凌辱但依然保有其内心的自由。例如,在小说中,她通过克里斯的回忆写道,“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辱和受难,失去了亘古的定义……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p. 107)。她希望通过扶桑来实现文化反拨、重构东方主义,从而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表达对平等的诉求。对于唐人街的那场华人械斗,她动情地写道,“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着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他们在拼杀中给对手的是尊重,还有信赖。……他们死给你看:死是最后一步,这一步都能走得这样从容,心甘情愿,它之前的许多步如歧视、诋毁、驱赶、殴打,还值得提吗?”(p. 155)她试图诠释东方的民族心理,做一次义正词严的发声。然而在翻译中,这样的表述被以“过度阐释”的名义被大量删除,而那些被过滤下来的声音也被美国读者认为太啰嗦,他们甚至坦诚“不愿被拉进严歌苓关于民族政治的争辩”(Samarasan, 2007:222)。

由此可见,严歌苓为移民族裔发声的努力可谓收效甚微,西方中心主义的壁垒依然非常顽固。

(3) 难以再现的语言特色

“语言是一种生命感觉，这是严歌苓写作的核心”。（黄万华，2007：88）《扶桑》在汉语世界的成功与小说精致的语言分不开。正如评论所言，“此作引人入胜，甚至让人着迷的，显然并非这个爱情故事本身，而是它的叙述风格和语言。大量的描写性的话语，讲究的用词，诗般的韵律，鲜活的比喻使文字充满了张力”（韩晓军，2000：44）。

然而，在翻译中，因为语言的天然隔阂和译者的刻意过滤，这些特色都很难在英文中再现。如，

例一：那身体没有抵触，没有他预期的抗拒，有的全是迎合。像沙滩迎合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她的肌肤是海滩上最细的流沙，那样随波逐流。某一时刻它是无形的，化在海潮里。（p. 61）

译文：She wasn't resisting as he had expected, but accommodated herself completely to the man. The way the beach accommodates the tide. (p. 62)

中文的繁复与诗意在英文中变成了简单与直白。“没有抵触，没有他预期的抗拒”被简化成“wasn't resisting as he had expected”，少了语言的节奏和抒情的意味。而中文“肌肤”与“流沙”的精妙比喻则在英文里被省略，失却了原有的光彩。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语言的简化以外，大量描写性语言的删除则在译文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严歌苓这样描述扶桑与克里斯的重逢：“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胸膛，上面的绒毛像刚生出的海藻那样在水里浮动。也没见过这样温和丰腴的手，手背上带着酒窝，随手的动作深了或浅了。”（p.186）这段细腻的描述和诸多细节描写一样在英文里无迹可寻，因此美国读者难以领略严歌苓新奇的想象以及遣词造句的惊人才华，无怪乎《旧金山纪事报》在介绍时称其语言“简单”（“simple prose”），而亚马逊网站上读者称其语言“贫乏”（“sparseness”）则更让人忍不住为严歌苓叫屈。

2. 《扶桑》英译本畅销之后的启示

（1）翻译策略的取舍

长期以来，以读者为依归，以市场为导向的本土化翻译策略都为美国图书翻译市场的主导趋势。为了保证酣畅的阅读体验，确保读者不被“惊动”，原作在语言风格、文化传统以及文学特色上都受到了一定过滤，其异质性往往被无情抹杀。而且，为了达到本土化的效果，译者和编者采取的通常是最粗暴的手段，即直接删除，不仅是单个句子的删除，而是大段的删除。这种处理方式固然简单省事，但是也暴露了对原著的极不尊重，同时也纵容了美国读者，使其养尊处优地让外来文学适应自己，而无法增进其对异质文化的了解。例如，小说译本中所保留的异国风情依然停留在美国读者所熟悉的套路，如小脚女人、长辫男人等，对于真正涉及到华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如度量衡、穿着、用具等真正差别，译本却放弃呈现，这样只能加深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固有偏见。笔者以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英译，可在本土化翻译策略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陌生化翻译的比重，尽量避免文字的大段删减，不断提升美国读者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出去”奠定基础。

（2）商业出版社的利弊

不可否认，《扶桑》译本在美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商业出版社的专业运作。和大学出版社相比，商业出版社对读者审美趣味的了解更透彻、资金更雄厚、销售渠道更广、推广手段更丰富，更有实力将作品打造为“畅销书”。

但与此同时,《扶桑》的译介也很好地暴露了商业出版社的弊病,即对作品的不够尊重,删减改动的程度太大,对市场过于迎合,对利益过于趋附等。

笔者以为,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商业出版社的模式依然值得借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地位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他们也应该更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大多数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文,往往只能任由译者和编者进行删改。即使是像严歌苓这样精通双语的作家,其意见也没有得到译者和编者足够的尊重,导致了译作与原作的一定偏离。另外,作为作者、读者、编者之间的桥梁,译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他们不应该对编辑的意见亦步亦趋,而是应更多地捍卫原作的品质和价值。

四、 结语

整体而言,《扶桑》的译介依然不失为华语文学译介的成功范例。它成功地打入了美国主流文学市场,使更多的读者听到了来自异质文化的声音,并有了继续听下去的欲望。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受西方中心主义壁垒影响,沟通的渠道还并不畅通,传达的信息并没有被完全接收,其“畅销”是以美学价值和政治抱负的牺牲为前提的。

当然,十二年已经过去,和《扶桑》的译介时的形势相比,“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欲望有所增强……我们通过文学来表现的中国文化,表现的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开始耐烦了”。

(严歌苓,2012: 33)因此,在今后的译介中,我们可以在尊重本土化策略的前提下,尝试更多地保留文本中的异质性,提升作家在翻译过程的话语权,并且呼吁译者更大胆地捍卫原作的品质和价值。

参考文献

- Booth, C. Wayne.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Kinkley, C. Jeffrey. "Review of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2(spring):136-137.
- Samarasan, Preeta. "Putting words in other people's mouths: on empathy and ventriloquism in fiction". *Michigan Quarterly*. 2007(winter): 212-225.
- Silber, Cathy. *Nushu(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hD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5.
- Towey, A. Cathleen. "Review of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Library Journal*.2001(2):203-204.
- Wen, Jin, "Reading Yan Geling's *Fusa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4): 570-600.
- Yan, Geling.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New York: Hyperion. 2001.
- Zhang, Ju. "Ignoble Fate and Noble Sentiment: On Yan Geling's Feminine Mentality and Her Immortal *Fusa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11(6). 14-19.
- 毕飞宇. 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 中国翻译.

2012(3).

陈丽娟.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自我反思的立场. 博士学位论文. 岭南大学, 2011.

陈瑞林. 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华文文学, 2003(5): 35-61.

葛浩文. 漫谈中国新文学. 香港: 香港世界出版社, 1980.

葛浩文、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 当代作家评论, 2009(6): 45-56.

公仲.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 中国翻译, 2010(6): 10-16.

华慧. 葛浩文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 东方早报, 2009-04-05.

黄万华. 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吉首大学学报, 2007(9): 88-92.

季光邈. 文学概论书系 第五编 抒情作品论, 童炜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刘亚伟. 美国没什么人看名著. 人民早报, 2004-03-02.

罗福林. 中国文学翻译的挑战. 中国作家协会、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演讲汇编. 2010.

马会娟. 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 中国翻译, 2013(1): 64-69.

王德威. 短评《扶桑》. 严歌苓. 扶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6. vi-vii.

王德威、季进. 评论与翻译——王德威访谈录. 当代作家评论, 2008(5): 68-78.

严歌苓. 扶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严歌苓、李亚萍. 与严歌苓对话. 中外论坛. 2005(5). 转引自周颖蓓.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2010.

严歌苓、沿华. 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 中国文化报, 2003-07-17.

袁榕. 文学翻译中陌生化和本土化的策略取向与冲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

http://www.waterbridgereview.org/122006/cnv_schwalbe.php (accessed 2013-7-10)

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996726.The_Lost_Daughter_of_Happiness (accessed 2013-7-10)

<http://www.usatoday.com/life/books/best-selling/> (accessed 2013-07-10)